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道德审视

——基于公正和关怀的二元向度

孙丹薇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无锡 214122)

摘要: 在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背景下, 从道德之维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全过程审视是摆脱教育实践困境的必然路径。这种道德审视, 源于深厚的学理依据、历史积淀与现实考量, 不仅是确保思想政治教育道德合理性的关键, 更是实现其功能价值的内在驱动力。道德公正与道德关怀两大取向各有独特优势与潜在局限: 前者致力于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则理性与价值普适性, 后者聚焦于彰显教育过程的情感联结与个体主体性, 二者的互补性共同构成相对完整的道德审视视角。但在现实中, 工具理性催生的功利化倾向、理想化目标与认知现状脱节以及情感关怀缺位引发的交流障碍, 均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张力产生消解作用。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转型必须回归德性本质, 通过理性思考与人文关怀的有机融合, 推动个体道德提升与社会和谐关系构建。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道德公正; 道德关怀; 现代化; 德性回归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6)06-0322-09

A moral review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dual dimensions of justice and care

SUN Danwei

(School of Marxism,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nurturing talents in the new era,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moral perspective is an inevitable path to break through the practical predicament of education. This moral review, rooted in profound theoretical basis,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and realistic considerations, is not only the key to ensuring its moral rationality, but also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realizing the functional valu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two orientations of moral justice and moral care each have their unique advantages and potential shortcomings. The former is dedicated to constructing the rule rationality and value univers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le the latter focuses on highlighting the emotional connection and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in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The complementarity of the two constitutes a complete moral review perspective. However, in reality, the utilitarian tendency caused b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idealized goals and cognitive status quo, and the communication barriers caused by the absence of emotional care all have a dissolving effect on the value tens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refore,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ust return to its virtuous essence, so as to promote individual moral advanc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al relations through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rational thinking and humanistic care.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oral justice; moral care; modernization; virtue regression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都迫切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1]。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的提出,凸显了道德维度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中的核心价值。“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道德教育自古以来便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与教育实践的融合程度,直接影响育人功能的实现与社会价值的彰显。

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维度已展开多层次研究。尤然等^[2]、刘云林^[3]从价值论层面,肯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论上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善教,实现善教的动态过程是立善心、启善行、建善功的逻辑递进;蔡小葵^[4]、叶欣欣^[5]则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切入,探讨其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指导价值与运用路径。也有学者进一步研究道德的不同维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例如:吴文莉等^[6]论证了道德关怀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原点要素的重要性;王东莉^[7]构建了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内容体系;王淑琴等^[8]、韩桥生^[9]则聚焦思想政治教育的公正维度,分析其对社会构建与制度视野中的价值。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两点局限:一是多侧重思想政治教育的单一道德维度(或关怀或公正)的独立探讨,对公正与关怀关系的系统性分析不足;二是对道德这一要素如何支撑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转型的研究不够系统,且缺乏实践层面的路径构建。鉴于此,本文以公正与关怀的辩证关系为理论框架,立足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实践语境,通过梳理二者的互补性特征,剖析当前教育实践中道德维度的现实困境,并探索二者融合驱动教育现代化转型的具体路径。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性依据

教育的崇高价值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进人的幸福感,因此被誉为“一项充满道德光辉的事业”。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主体向被教育者传递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的实践活动,其功能的实现同样与道德合理性紧密相连。然而,事物不能因其原初的道德性而获得自身善的证明^[10]。换句话说,尽管在应然层面上思想政治教育被赋予了道德性的内涵,但这仅仅是一种理论构想或预期状态,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实际教育过程中必然符合道德标准的事实。为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充分的道义正当性,其目

标的厘定和内容的布局应当建立在道德考量之上,即在价值取向、实践方式与结果指向等方面均符合基本的道德规范与伦理要求。在深入探讨道德公正与道德关怀两种取向如何作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之前,需要首先思考这一研究路径的合理性与意义。

首先,在学理层面,马克思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核蕴含着对道德层面的深刻关切。马克思借助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对道德的社会属性及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作了详尽而独到的阐释。在他看来,道德的独特性在于其以引导行为、塑造正当行为方式为旨归,进而彰显出特殊的实践精神。马克思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终极目标^[11],并由此强调教育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的重要作用。他在《资本论》中指出,“未来教育……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2]尽管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无法完全实现,但其理念仍有价值,即个体应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和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坚守以被教育者的自由全面成长为导向的伦理原则,致力于引导他们积极塑造理想的人格典范,并持续推动他们朝着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稳步前行。

其次,在历史层面,思想家们通常基于对人性的理解来评判特定制度或社会的立场,或批判或褒扬。理想的社会形态应致力于人性的解放和精神的充实。马克思及其无产阶级理论之所以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批判态度,根源在于该制度未能充分释放社会生产力的潜能,并显现出雇主剥削劳动者的非人道特质。

在中国,思想政治活动的道德基础历来备受重视。西周时期的思想家提出了“修德配命”的观念,为稳固政治权力提供了伦理道德层面的支撑,这实际上是在阐释,周王以其高尚德行赢得了上天的认可,故而拥有了统治万民的合法权柄^[13]。同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之所以正当,是因为它针对的是“腐朽的旧社会”。这不仅为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者提供了道德层面的正当性,也为其执政奠定了坚实的道德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三个代表”“全过程人民民主”等理念的实践,更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道德合理性。

最后,在实践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目标具体体现为其所传达的价值体系被教育者所认同,以及所确立的行为规范为教育者所遵循。达成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激发被教育者的主动参与意识,包括配合教育者活动的积极性,以及对教育内容进行选择、评判与践行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的驱动力往往源自被教育者的动机,进而影响其行为选择。只有在被教育者的正当权益得到充分尊重与保障的前提下,才能激发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与接纳,进而在道德价值层面形成内在认可。因此,被教育者权益的认可和满足不仅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追求的核心要素,更是其合情合理与行之有效的根本所在,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固基底。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目标的实现过程中,道德性所处的关键地位日益凸显,其内涵的深度与外延的广度,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价值指向与育人实效。

经过对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性的多层面考量,可对其本质属性进行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性,是其作为育人实践的价值根基与行动准则,既体现为“合乎道德要求、合理合法”的规范属性,更彰显为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价值引领与人格培育功能。这种道德性不仅构建起理想的教育伦理环境,明确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在实践中应遵循的价值规范,而且通过个体在教育实践中形成的道德判断能力与责任意识,与政治德性所指向的价值目标和行为导向相互作用,实现育人目标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范式,思想政治教育既承载着道德性的育人使命,又肩负着政治性的价值引领功能。其道德内核以“以人为本”为基本原则,通过塑造个体道德人格为政治性使命提供伦理支撑;而政治性所蕴含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政治德性引导,又为个体德性建构提供价值认同基础。个体道德素养的提升能够强化对政治理想的价值认同,而政治德性的社会化过程又反哺个体道德认知的深化,二者形成辩证统一、互为表里的耦合关系。只有当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真正立足于人的发展需求,将道德的价值牵引与政治的理想追求有机统一,才能实现育人目标与社会功能的双重彰显,切实发挥其教育本质的真实效用。

二、思想政治教育道德维度的二元范式解析

在确认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本质后,进一步探讨其所承载的道德准则及其导向。道德取向的探讨

在道德心理研究中占据基础性地位,同时也是道德价值判断中的关键议题。在道德取向的多元观点中,以皮亚杰和柯尔伯格为代表的道德公正论,与以吉利根和诺丁斯为代表的道德关怀论,构成了两种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取向^[14]。长久以来,道德公正作为传统道德哲学的核心,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这一领域迎来了一股新的思潮。吉利根^{[15][11]}基于女性群体的实证研究,提出了道德关怀的崭新视角,这不仅为道德哲学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更在女性主义哲学、道德心理学以及道德教育等多个学科中迅速崭露头角,形成了一股与传统道德公正观念相抗衡的强劲力量。两种道德取向在道德判断与行为形成等研究问题上存在一定交叉,但在具体理论立场上呈现出明显差异。

(一)道德公正取向: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则理性与价值普适性建构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柯尔伯格^[16]以道德哲学、道德教育与道德心理学的跨学科视角,系统阐述了“三水平六阶段”的道德发展模型,并据此提炼出道德公正的核心价值。柯尔伯格及其追随者所倡导的道德公正取向,源自道德认知发展的相关研究,其论证以个人权利与契约精神作为理论支点,并以人与人之间相对独立的个体关系为前提,强调在人际互动中对平等地位、互惠原则与规则正当性的遵循^[17]。亚里士多德指出:“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括。”^[18]日常生活中,个体在面临抉择时,往往首先依据普遍且抽象的道德准则,即公正原则,进而通过逻辑推演与分析,最终作出决策^[19]。公正的理性特质引领了以它为核心价值的道德教育,形成了一种从认知到行动的教学模式。道德成长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可视为公正认知持续增强的过程。道德教育作为这一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致力于引导道德主体深化对公正理念的认知,其核心在于培养道德主体在道德推理、价值判断等方面的认知能力。在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互动中,被教育者更多感受到的是教育的原则导向性、逻辑严密性和思维理性,而与之相对的,关怀的细腻、情感的温暖以及触动心灵的瞬间等情感要素,在当前的道德教育框架中似乎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融入^[20]。

公平正义作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石,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更是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道德标杆和社会发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为了构建公平、正义、有序的社会环境,并推动公民个体的全方位自由发展,一个高效且有力的政

治社会化过程显得至关重要。在此过程中,教育主体应着重强化对被教育者公正观念的涵养,通过增强其对公正社会的理解与认同,进而为公正社会的实现积聚坚实力量^[21]。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在提升社会公共性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核心在于培育个体的公共理性。其影响不仅体现于对个人思想与行为的深层塑造,更表现为对现实思想文化的筛选以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通过提升被教育者的公共理性和公共品质,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激发社会成员的公共精神与社会归属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不同阶级、阶层或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扮演着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角色。人类社会由众多交织关联的利益共同体组成,它们共同遵循着理性秩序的普遍法则。在此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独特的批判功能和价值导向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强化这些功能,能够引导人们自觉遵循共同的道德规范,不仅在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利益时保持积极态度,还会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由此,以社会共识为基础的道德秩序将得以稳固,公平正义的社会原则也将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和遵循。最后,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消解公正认知的多元歧义来培育公民的公平理性意识。受个体成长背景、历史发展阶段差异的影响,公正观念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均贫富”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以及道家对社会不公“无为而治”的消极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个体对现代公正认知的复杂性。加之现实中存在的违背公平正义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公正概念理解的分歧。对此,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系统梳理不同认知维度,以科学的价值导向澄清误区,消除公众在接受公正理念时的认知障碍,最终引导个体形成关怀他人、扶助弱者的理性公平观,为社会和谐发展筑牢价值根基。

(二)道德关怀取向: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联结与个体主体性彰显

关怀之所以逐渐被确立为一种重要的道德取向,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柯尔伯格的学生吉利根(Gilligan)、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诺丁斯(Noddings)等女性心理学家及教育家将对公正视为道德教育单一核心价值所展开的批判性思考。吉利根^{[15]2-7}指出,公正虽基于理性追求平等,但忽视了人的感性需求,尤其是女性的细腻情感。个体不仅期望得到平等对待、享受基本权利,也渴望被理解与同情,以及与他人开展深入的对话和交往^{[15]14}。

诺丁斯^{[22]11}曾强调,在人生的特定阶段,如婴幼儿期、病痛或衰老时,人们最渴望的是关爱与呵护。基于这样的洞察,一个充分发展的人,必然与社会和他人保持紧密的联系。在这样的环境中,道德的功能远不止于依赖公正来捍卫制度、规则和权益,而是亟待一种能推动人际和谐、营造社会温馨氛围的核心道德价值来支撑。关怀论者对道德发展的看法与公正论者大相径庭。他们认为,和谐与关爱在多数情况下更能推动人的道德成长,因为真挚的情感为行动提供了强大的动力^[23]。相较于公正所倡导的“认知—行动”教育路径,关怀论者更偏向“情感—行动”的教育模式,即将情感教育置于核心地位^{[24]25}。关怀型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以自身深沉的关怀情感为出发点,通过言谈举止传递情感的力量,从而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

在当代中国,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关怀的探讨,源于对道德公正的理性特质的现实叩问以及以人为本属性的时代呼唤,需摒弃过度依赖物质标准的工具理性思维,转而关注人的道德本质与精神追求,重塑人的崇高理想和高尚品质,还原人的本质、价值和尊严。首先,强调被教育者基于主体地位的自发性的道德水平提升。个体对于自身主体地位和独特性的深刻认识,不仅涵盖个体在生理、精神、情感层面的需求,更包含对于潜能开发、个性发展以及对崇高理想追求的自我觉醒。道德关怀在此强调人性的尊重与唤醒,保护被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倾向于采用更为人性化、渗透式和激励性的教学方法,促使其自发地寻求人生的完善和提升。其次,鼓励个体需要的满足是规避教育“曲高和寡”的重要手段。被教育者倾向于从自身需求的角度出发,评估教育内容对其个人发展的实际价值,进而作出接受或排斥的决策。道德关怀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个体需求的重要性,倡导尊重个人的自我实现和利益追求,鼓励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来追求正当利益,并对个体成长过程中的合理需要和利益给予充分的关注和支持。进一步,关注与个体实际生活相契合的道德体验。“生活现实”不仅是人们生命活动的根基,也是人们本质面貌的真实展现。任何脱离现实生活的教学活动,都将变得抽象、僵化,失去实际意义。思想政治教育紧密关注人的日常生活,努力引导人们回归生活并超越其表面,从而不断丰富和深化被教育者的现实生活体验,用美好的生活范式引领日常生活,用善良的生活态度唤醒那些尚未达到理想状态的生活形态。最后,道德关怀将

激发超越性的人生追求。人生不仅局限于个体当前的现实状态,更在于对理想境界的追寻与向往。从促进人格完善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视角出发,精神家园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它构成了个体人生的精神支柱与信仰归宿。在道德关怀的指引下,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聚焦于人们当前的生活状态,更鼓励人们深入思考生存的本质与价值,不断对既定的生存与发展模式进行反思、批判与超越。最终,个体将在有限的生命旅程中,领悟到人生意义的无限丰富与价值。

三、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偏离的道德审视

道德公正与道德关怀两大取向各有独特优势与潜在不足。道德公正取向强调理性与规范,而道德关怀取向则聚焦于人际理解与对话的深层面,此乃二者之优势所在。然而,它们亦存在局限性,即:道德公正取向有时过于强调权利与准则的纵向等级结构,而道德关怀取向则可能过分倚重情感因素。由此可见,二者在道德审视的维度上互为补充,一方的优势恰好能够弥补另一方的不足,共同构成思想政治教育道德审视的完整视角。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性必须扎根于现实土壤。这意味着考虑问题的思路需要从理想化的“应然”状态转向具体的“实然”状况,从抽象的“理论”框架转向实际的“现实”层面,并从普遍的“一般”原则深入到偶发的“特殊”情境。通过这样的转变,我们能够更加精准地审视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设计与实践操作是否符合道德规范,进而揭示其中可能存在的道德摇摆问题及其原因。

第一,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张力关系未能得到恰当处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价值追求的内在协调性。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层面承载了培养人才的重要使命,同时在个体层面致力于塑造被教育者的优秀思想政治品质与行为准则。尽管追求个体价值的“广泛认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但由于长期受我国深厚传统文化与政治导向的影响,其价值重心往往偏向于政治需求和社会属性,过于强调个体对社会的服从与认同,而对人的个体价值、自主精神、能动性和创新力等方面的关注略显不足^[25]。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特定时期的社会目标,如战争时期的军事需求、经济建设时期的经济发展需求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需求。在教育实践中,往往采用集体教育和标准化教育模式,力图引导被教育者融

入社会、适应社会。例如,中小学开展的统一主题班会活动多围绕社会主流价值观宣讲展开,高校思政课讲授也以国家战略、社会发展宏观议题为主,但对学生个体易遇到的人生价值迷茫、道德选择摇摆问题关注不足。这种统一化的培养目标,与被教育者所展现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独特性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匹配现象。从个体发展的视角来看,这种教育方式未能充分尊重被教育者自由全面发展的个性选择,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其在价值协调与道德关照方面的不足。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理想化的目标设置,脱离了被教育者的道德认知现状与发展需求。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目标,“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无疑具有深远意义。但就实际教育层面而言,特别是在中小学阶段,部分课程在设定教学目标时未能紧密结合学生当前的道德认知实际。比如,在讲解“共产主义理想”时,多聚焦于宏大的社会愿景描述,但未与“帮助同学、爱护公物”等日常道德实践相结合。课堂教学中过分强调共产主义理想、道德信念等高尚情操,要求学生树立超越当前社会阶段的远大目标,这无疑使得教育脱离了实际,成为空中楼阁。同样,在企业层面,对于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存在类似问题。如部分互联网企业在员工培训中,过度强调“企业战略落地”“市场竞争狼性”,将员工个人价值与业绩指标直接挂钩,忽视员工在高强度工作下的心理疏导需求、职业发展困惑,这样的教育往往被视为一种“无用的洗脑”。必须认识到,被教育者是多元化的群体,他们的知识背景、接受能力等存在较大差异。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不难发现,其理想化倾向往往导致目标在合理性、科学性方面存在不足,以及对当代社会结构与实践条件变化的回应能力上难以达成。这种目标设定不仅无法有效提升被教育者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反而可能使他们在面对崇高的理想信念时,感到困惑和无力。

第三,在工具理性的深刻影响下,思想政治教育容易使教育主客体在价值判断上呈现功利主义取向。尤其是在工具理性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这种理性逻辑不断渗透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进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形态与发展方向产生深远影响。虽然多数教育者强调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但受限于政治、法律与制度框架和教学要求,教学内容往往显得单调乏味,缺乏实际应用的生动性。在评价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价值时,侧重考量其所包含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强调教育内容的实

用性。但这种强调“有用性”的教育模式使得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陷入了一种政治与经济目标导向的功利主义中^[26]。思政课的考核常以知识点背诵准确率、课后作业完成度为核心评价指标,学生为获得学分和成绩往往机械记忆理论条文,而未真正理解其内涵;部分中小学在开展红色教育活动时,为应付上级检查,仅以学生活动参与人数、拍照打卡次数作为成效衡量标准,忽视教育过程对学生情感的触动。在这种倾向下,个体的实用价值被过度放大,而作为理性存在的尊严则被忽视。更为严重的是,在工具理性操纵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体系渐趋“目的化”和“抽象化”,教育的主体和客体在道德理想、情感良知等价值理性方面被弱化乃至消解,逐渐沦为工具理性支配下的附庸,丧失了对精神世界的向往和追求。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情感关怀缺位与传统的单向教学方式,无疑阻碍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情感与思想的深度交流。在马克思的观点中,理想的思想教育主客体关系应建立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诚然,传统的“一言堂式”教学方法在特定历史阶段有其必要性,但在当前互联网信息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态势下,其局限性愈发凸显。部分教师照本宣科讲解教材,面对学生提出的“校园欺凌如何用道德准则应对”“网络言论自由与社会责任边界”等现实困惑,常以“课后再讨论”搪塞,未能及时地、正面地回应学生思想需求;高校思政课多采用百人以上大班授课,教师难以关注到个体学生的课堂反馈,课后也较少深入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这种“自上而下”的教学模式固化成为一种思维惯性时,不仅造成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身份关系的不平等,而且使“知识传授”变得空洞且难以产生情感共鸣。被教育者的思想困惑未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和探讨,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进而可能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及意义产生疑虑,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排斥。更为关键的是,在应试与灌输的教育模式下,被教育者的情感需求往往被忽视^[27]。这种“效率优先”的教育环境、“机械化”的管理方式以及“技术化”的交流手段,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关怀”淡化。情感作为人本质力量的重要体现,其缺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难以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如何在教育中融入情感元素,使教育过程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不仅关系到教育内容的道德性,更影响教育活动的吸引力与实效性。

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德性回归

随着世界历史演进的洪流,现代化已然成为无法逆转的趋势,更被视为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标志。在此过程中,个体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其思想认知的更新、能力结构的提升与社会关系的重构持续推进。与此同时,社会亦积极致力于培育个体的现代素养,以匹配现代化进程对人才的多维度需求。作为提升道德水准、凝聚社会共识和引导价值观念的重要工具,思想政治教育在推动人与社会共同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不管是以道德关怀为取向还是以道德公正为取向,其共通之处均在于植根于人的基本需求,即基于道德主体对他人与社会发展的深刻理解,来深入剖析道德的本质,并据此推动个体的道德成长。因此,不应仅停留对两种取向的优劣评判,而要正视它们各自的局限性与独特优势,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共同推动人类和谐关系的构建与发展。

(一)由工具理性迈向价值理性:思想政治教育功利化的破解之钥

柯尔伯格将道德判断中的理性成分视作道德行为的核心驱动力,即个体道德认知的触发将引导其道德行为的产生。在现代社会中,理性虽被广泛颂扬为带来社会繁荣的关键要素,但韦伯从社会学视角对理性进行了批判性考察。他通过区分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指出现代社会中的行动往往以达成特定目的为导向,由此凸显出工具理性在社会运行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而言,韦伯将资本主义的发展解读为一种持续的理性化过程,并揭示了在这一过程中工具理性被过度强化进而侵蚀价值理性的风险^[28]。在他看来,对理性的单向度推崇不仅难以解决现代社会的深层问题,反而可能加剧人类生存的困境,最终对个体的自由与生存意义构成威胁。同样,马克思亦通过其异化劳动理论,对资本主义市场原则主导下劳动与生存的异化状态进行了深刻批判,进而对现代社会中理性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张力作出了重要反思。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两个紧密相连且互为补充的概念。工具理性侧重于通过计算和预测来实现目标,它主要聚焦于“实然”层面的现存事实,强调手段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解决在实践层面“如何达成”与“实施策略”的问题。价值理性体现了一种对价值和价值追求的内在自觉意识,它聚焦于“应然”层面的价值关联,旨在为行为主体构建行动的核心理念、

指导原则、信仰目标和最终目的等。价值理性通过审视主体活动的目标是否契合终极价值,以及这些价值是否满足人性的内在需求,进而在伦理层面探讨“应当如何”与“理想状态”的问题。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了精神层面的驱动力,是行为主体在追求目标过程中的价值导向。同时,工具理性也为价值理性的实现提供了实际支撑,是确保价值理念能够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桥梁。两者缺一不可,片面追求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可能造成人性的扭曲和行为的失范。

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工具理性倾向于强调对事实层面的认知和把握,追求教育行为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效率性,往往将人的价值目标视为超越人性的外在标准。而价值理性则超越了单纯的事实认知,它深入探索人类对于“善”与“幸福”的精神追求,将人的价值目标内化为人性的核心^[29]。但当前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道德理性层面呈现出失衡态势,具体表现为工具理性的过度强调和价值理性的相对削弱,这种现象正在逐步将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事业推向物质化的轨道。不应将教育主体孤立化、教育内容先验化,也不应简单地将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化、工具化,这些都属于片面的工具理性表现。相反,我们需要一种能够融合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的交往理性。例如,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计中嵌入“道德情境模拟”模块,通过校园欺凌应对、公共资源分配争议等具象场景,引导被教育者在体验中整合“知、情、意”;又或者在生成式 AI 大模型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发挥数字技术的作用之余,要坚持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警惕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并防范技术风险,避免以技术导向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塑造^[30]。这种理性能够克服盲目的功利主义倾向,使思想政治教育回归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进而真正实现其应有的教育目标和意义。道德转型从工具理性迈向价值理性,与思想政治教育在政策层面的道德指向和教学实践中的理性追求紧密契合。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以科学性和效率性作为行动的基本逻辑,以道德自觉与公共精神为核心价值导向,将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追求作为终极目标,纠正那些“效率至上”的盲目倾向与“缺乏远见”的错误认知,肩负起实现民族振兴与人类长远发展的崇高使命。

(二)从被关怀到关怀他者:思想政治教育温度与实感的重塑之径

道德关怀是在关怀者与被关怀者之间形成的关

系形态,其内在互动性体现了关怀的核心特质。关怀伦理学派主张以关怀作为教育的核心基础,强调在教育实践中应注重构建与维系关怀关系,在师生互动中体现得尤为突出^[24]。在探讨关怀的多样性时,关怀被细化为自然关怀与伦理关怀两大类。伦理关怀通常依赖个体的道德自觉与意志努力,而自然关怀则源自个体对他人需求的直接回应,不需要过多依赖伦理推理或理性判断。这种自然关怀的动机与我国古代教育家孟子所提的“性善”理念相契合;但值得注意的是,自然关怀并非天生具备,而是需要通过持续且专注的培养来逐渐完善^[31]。由此可见,培养自然关怀能力显得尤为关键。

诚然,在社会观察中,女性常被视为“关怀”的显著代表,但“关怀”这一理念实则超越性别界限。所有身处压迫、歧视、侵害环境中的施暴者和旁观者,都应肩负起“学习关怀”的责任,而任何因不平等对待而受苦的个体,都应当享有被关怀的权利。若思想政治教育中缺失了“关怀”这一核心要素,则由此引发的关怀缺失危机将加剧社会问题的蔓延。当前,全球范围内未成年人犯罪率不断攀升,校园暴力和自杀事件屡见不鲜,这其中,施暴者与受害者对关怀的漠视与缺失,无疑是重要的诱因之一。正如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言:“如果人的空虚和寂寞不能克服,它们总是会导致不安全感、焦虑感和罪恶感的产生。”^[32]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框架下,“学习关怀”应被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教育目标,旨在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最基础且不可或缺的道德纽带。

在道德关怀的价值导向下,思想政治教育者须从“义务性”关怀转向“自发性”关怀,实现由伦理关怀到自然关怀的深化。教育心理学在分析群体互动机制时,形成了一种关于行为示范与扩散的经典解释框架,通常以“涟漪效应”指称个体行为对群体产生的连续性影响。同样地,关怀教育亦能产生类似的涟漪效应,即在教育互动中形成关怀的示范力量。当个体看到关怀行为得到社会的认可与赞扬时,他们倾向于模仿这些行为^[33],进而从个体层面扩散至社会层面形成广泛的关怀力量,最终汇聚成关怀的“涌动效应”。在教育实践中,教育者须致力于使被教育者深切体会到其给予的真诚关注与关心,可通过组织关怀经验的交流与分享活动,由教育者讲述在帮助学业困难学生、疏导个体心理焦虑等方面的具体实践,并在相互评议中提炼出可借鉴、可推广的关怀策略。同时,可在班级层面引入关怀行为的记

录与反馈方式,鼓励被教育者记录日常中的互助行为,由教育者定期选取典型案例进行课堂分享与讨论,以此激发被教育者的关怀意识,促使其主动学习并践行对他人的关怀。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被教育者体会教育者的自然关怀——培养关怀意识——转化为关怀他人——作为教育者继续传递自然关怀给新的被教育者^[34]。若能成功构建这样的良性循环,即从伦理关怀的层面提升至自然关怀,进而实现被关怀者向关怀者的转变,这将极大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及其人文价值。

(三)贯穿学校、家庭、社会之关怀:大思政协同育人体系的逻辑核心

立德树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使命与价值引领,它与思想道德的培育、文化知识的传授以及社会实践的融入紧密相关。“立德”旨在锻造高尚的品德,“树人”则侧重于塑造具备全面素养的人才^[35]。这两项任务所涉领域广泛复杂,实施过程既漫长又繁复,其难度之大使专业课程思政教师亦倍感压力。对被教育者而言,道德思维的成熟与道德判断力的提高,需要教育者不仅尊重其主体性,还须具备跨学科知识融合能力与应对复杂道德困境的智慧。诺丁斯^[22]⁶⁷强调,教育是许多有意或无意的相遇经历,这些经历通过促进被教育者对知识与技能的掌握、理解力与辨识力的提升,进而推动其全面发展。同样,陶行知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理念,亦强调教育应围绕生活展开,与生活紧密相连。而事实上,仅凭单一的教育力量,难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宏伟目标。

道德关怀的核心在于深切关怀个体,尊重人性价值与尊严、构建人际和谐与共同发展。这与大思政协同育人体系倡导的全员参与、全程渗透、全课程覆盖、全方位发展的理念不谋而合。唯有积极地谋求学校、家庭、社会三方主体在教育上的协同整合,才能让公正和关怀的理念渗透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时刻。从公正和关怀的双重向度来看,学校、家庭与社会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承担着分工有别而又相互补充的功能。学校以课程体系和制度化教育活动为载体,通过为被教育者提供相对均等的参与机会和明确的公共理性培育目标,体现公正价值;同时,借助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个别指导与心理疏导,融入关怀取向。家庭则依托亲情纽带,在家风传承和日常生活中以对成员权利的平等尊重践行公正,以情感陪伴与困境支持夯实关怀基础。社会层面依靠公共空间和社会机制,通过社会责任与权利义务的相

对公平落实彰显公正,同时以社区互助、公益实践等方式延展关怀的社会维度。三者和功能侧重与资源条件上的差异,使其在育人过程中形成协同互补的整体结构:学校提供系统化的思想引导与规范框架,家庭塑造稳定的情感支持与道德习惯,社会则为价值认同与道德实践提供现实场域,共同促进被教育者在理性认知与情感体验上的协调发展。可以说,三者共同构筑出一个多维度、全方位的思想教育网络,保障教育的连贯性与一致性、实践性与体验性、全面性与深入性,从而培养出更多兼具高尚道德品质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才。

新时代背景下,大思政协同育人体系的高质量发展已成为研究焦点。鉴于数字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深度渗透社会各层面,为思政教育领域带来广阔拓展空间,探寻信息技术驱动的协同育人模式愈发关键。数字化时代的大思政协同育人体系,需主动吸纳资源整合的“互联网思维”、以学习者为本的“用户思维”、内容精简可视化的“简约思维”、顺应时代步伐的“迭代思维”、行为数据分析的“大数据思维”以及共建共享的“平台思维”,将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育全过程。更进一步,应探索各级各类教育的纵向贯通与横向融合,强化学校、社会、家庭教育的密切配合与良性互动,构建个性化、终身化、网络化、数字化及智能化的“五化”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为被教育者营造更有益于道德培育与人格完善的成长环境,让公正与关怀在数字化载体中实现更高效的传递与渗透。

五、结 语

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肩负着道德教化与价值塑造的双重使命,其根本要义在于促成道德理性与政治德性的有机融合。作为国家精神建设的重要环节,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关涉制度层面的规范秩序,也承载着情感理解与人文关怀的伦理诉求,使教育实践同时具备原则的坚实与温度的流动。道德公正与道德关怀两种取向虽立足不同维度,但在教育场域中互为支撑:前者以理性与正当性奠定教育的价值基底,后者以共情与理解赋予教育以生命活力。二者的融通,使思想政治教育得以超越单向灌输的模式,在互动与共鸣中生成道德认同与主体自觉。进而言之,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并非止于行为规范的传递,而在于通过价值引导与情感涵化,促进个体德性成长与社会伦理秩序的良好建

构。面对现代社会多元价值并存与道德张力重构的现实处境,思想政治教育应更加注重理性与关怀的动态平衡,在实践中探索德性生成的多维机制与社会认同的内在逻辑,使其在塑造公民品格与重构社会伦理精神的过程中,持续彰显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价值与伦理意涵。

参考文献:

- [1] 项久雨.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要素的解释之维[J]. 思想理论教育, 2024(2): 55-61.
- [2] 尤然, 刘云林. 善教的证明: 道德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追求的三重向度[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2(3): 19-22.
- [3] 刘云林. 走向善教: 道德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递进[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9(3): 9-12.
- [4] 蔡小葵.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0(14): 40-42.
- [5] 叶欣欣.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路径[J]. 人民论坛, 2019(24): 236-237.
- [6] 吴文莉, 张澍军. 论道德关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原点要素[J]. 东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3): 210-213.
- [7] 王东莉. 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内容体系建构[J]. 教学与研究, 2005(2): 85-90.
- [8] 王淑琴, 李山岗. 公民思想政治教育之于公正社会构建的价值探讨[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0(2): 23-28.
- [9] 韩桥生. 政治制度公正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J]. 教育学术月刊, 2011(1): 28-30.
- [10] 赵汀阳. 论可能生活: 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153.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530.
-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12.
- [13] 杨豹. 道德价值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4: 324.
- [14] 于沧海. 试论道德的两种价值取向: 公正与关怀[J]. 学术交流, 2015(5): 52-56.
- [15] 吉利根. 不同的声音: 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M]. 肖巍,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 [16] 柯尔伯格. 道德教育的哲学[M]. 魏贤超, 柯森, 等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56.
- [17] 柯尔伯格. 道德发展心理学: 道德阶段的本质与确证[M]. 郭本禹, 何谨,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49.
- [18]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30.
- [19] 姜文. 公正伦理和关怀伦理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J]. 东岳论丛, 2010, 31(8): 186-188.
- [20] 王炜, 刘春媛. 从公正到关怀: 道德教育中核心价值的转变[J]. 中国青年研究, 2005(11): 79-82.
- [21] 田雪飞.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制度伦理价值研究[J]. 湖北社会科学, 2021(7): 162-168.
- [22] 诺丁斯. 始于家庭: 关怀与社会政策[M]. 侯晶晶,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
- [23] 袁玲红. 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形态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241.
- [24] 诺丁斯. 学会关心: 教育的另一种模式[M]. 于天龙,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
- [25] 阮博, 刘曼.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风险研判及其规避[J]. 学术探索, 2024(6): 150-156.
- [26] 舒豪, 孙迎光. 思想政治教育的未来样态、症候研判及应对策略[J]. 江苏高教, 2023(7): 84-90.
- [27] 张建晓. 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隐忧及其应对[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4(4): 53-64.
- [28] 韦伯. 经济与社会: 上卷[M]. 林荣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56.
- [29] 李东坡, 李欣明. 马克思“人的解放学说”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及启示[J]. 教学与研究, 2022(9): 75-83.
- [30] 黄飞凯, 杨万强. 生成式 AI 大模型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J]. 天府新论, 2025(5): 65-77.
- [31] 姜海滨. 人性向度的复归: “关怀”是高校德育工作新路向[J]. 中国青年研究, 2020(11): 87-93.
- [32] 弗洛姆. 爱的艺术[M]. 康革尔,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76.
- [33] 魏真瑜, 邓湘树, 赵治瀛. 亲社会行为中的从众效应[J]. 心理学进展, 2021, 29(3): 531-539.
- [34] 杨威, 赵媛.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然形态与应然形态[J]. 思想理论教育, 2025(2): 51-57.
- [35] 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 求是, 2020(17): 4-16.

(责任编辑: 雷彩虹)